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精神病理学与政治




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

〔美〕哈罗德·L.拉斯韦尔 著 魏万磊 译

与个体最近的精神病理学是最繁复的方法，
但是对人类人格进行研究却非它莫属。
——哈罗德·L.拉斯韦尔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

精神病理学与政治

【美】哈罗德·L.拉斯韦尔 著 魏万磊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病理学与政治 / (美) 拉斯韦尔(Lasswel, H. D.) 著; 魏万磊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2

(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ISBN 978 - 7 - 5117 - 2402 - 1

I. ①精…

II. ①拉…②魏…

III. ①政治心理学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2245 号

精神病理学与政治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杜永明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41(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55626985(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55626985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1
第一章 生活史与政治科学	4
第二章 精神病理学的方法	13
第三章 一种新的思维技巧	22
第四章 政治类型的标准	28
第五章 人格发展理论	46
第六章 政治煽动者	54
第七章 政治煽动者 (续)	72
第八章 政治管理者	87
第九章 政治信念	104
第十章 预防的政治学	117
第十一章 长期访谈及其客观化	137
第十二章 人格系统及其替代反应	148
第十三章 作为事件组合体的国家	162
附录 A 精选书目	179
附录 B 问题列表	187
索 引	193
译后记	203

序 言

我们可以通过分散或集中地研究集体进程来理解政治生活。在我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 in the World War*) (纽约和伦敦, 1927年版)一书中, 通过研究暴露于数百万人面前的象征符号, 我着手分析那些改变集体态度的因素, 而不考虑这些符号成为任何一个特定个人的经验的顺序。在《精神病理学与政治》的初步论述中, 我同样关注影响集体态度的因素, 但路数 (method of procedure) 截然不同。它不再是一个对暴露于无数个体面前的象征符号进行考察的问题; 当前的起点是对特定个体的历史进行长期的仔细审查。由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和结论对已有的个人研究有着最复杂、最富推动性的贡献, 因此目前它们备受关注。

对于我的前任导师和当下的权威, 芝加哥大学的查尔斯·梅里亚姆 (Charles E. Merriam), 我不得不再次表达感恩之情, 他不久前认识到精神病理学对于政治科学的重要性, 并一直乐于鼓励我在该领域内做开创性的尝试, 当然, 这并不表示无论在原则或细节上他都一定会赞同我的结论。通过他, 我才实现与哈佛大学梅奥 (Mayo) 教授进行特殊合作的可能性, 梅奥教授对精神病理学之于理解社会生活的意义深有领悟, 这种领悟在新奇而重要的商业实验中已经硕果累累。而获得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学金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Fellowship, 1928 - 1929) 使我赴海外学习成为可能。

在形势的“逼迫”下, 我一直与那些精神病理学界的代表人物保持着联系, 尽管有时短暂有时长久。他们中的许多人友善地将他们的想法和设备供我随时享用, 在此, 我感谢他们对我的询问如此慷慨和耐心, 尽管我还是个不太成熟的研究者。在那些了解现代心理学领域的实际情况, 深陷

于学派间斗争的战壕和弹坑的人当中，没有人能想象所有我要点名的人之间彼此看法一致，或者会心平气和地看待我的研究结果。我希望，我说出他们的名字不会过度地牵累他们。

其间，我得到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帮助，这些人包括：波士顿贝克法官基金会（Judge Baker Foundation）的威廉·希利（William Healy）博士；华盛顿特区圣伊丽莎白医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的负责人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博士；马里兰州谢泼德和伊诺克·普拉特医院（Shepherd and Enoch Pratt Hospital）的负责人罗斯·查普曼（Ross Chapman）博士；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医院负责人厄尔·邦德（Earl D. Bond）博士；纽约怀特·普莱恩斯（White Plains）的布卢明代尔（Bloomingdale）医院负责人莫蒂默·雷诺尔（Mortimer Raynor）博士；波士顿的波士顿精神病医院负责人麦菲·坎普尔（C. MacFie Campbell）博士；曾经在谢泼德和伊诺克·普拉特医院工作的哈利·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博士；圣伊丽莎白医院的刘易斯（N. D. C. Lewis）博士；来自布卢明代尔医院的塞缪尔·汉密尔顿（Samuel W. Hamilton）博士与格内高里·齐尔博格（Gregory Zilboorg）博士；波士顿精神病医院的韦尔斯（F. L. Wells）博士；维也纳的爱德华·希施曼（Edouard Hitschmann）博士和鲍尔·弗登（Paul Federn）博士；以及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博士和威廉·斯特克尔（Wilhelm Stekel）博士；来自布达佩斯的费伦齐（S. Ferenczi）博士；柏林的狄奥多·芮克（Theodor Reik）博士和弗兰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博士（现就职于芝加哥大学）。我的同事，斯图尔特·斯奈芬（Stewart B. Sniffen）博士和伦纳德·怀特（Leonard D. White）教授，在我原稿的写作过程中给我提供了宝贵意见，我采纳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在得到我早先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异常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国际伦理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上的文章的编辑们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及芝加哥儿童研究和家长教育协会的许可后，我得以自由地引用我的这些作品。

我尤其想要对那些我不能点名道姓的朋友们表达感激，因为他们在合作中，服从反复审查的安排，给了我最大可能的帮助。

应该指出的是，我引用的个案只占我已调查或已经占有的个案中的一小部分。其实应该提炼足够多的为讲解服务的个案，才能为这种理论素材提供背景。由于缩减了这些个案的数量和范围，本文已经避免了由无限拓展的“小威利的故事”（little Willie stories）所导致的晦涩。

本书第一部分的讲述采用了相当教条化的方式，这无疑趋向于遮蔽了当代精神病理学方法和素材本身的瑕疵。随后的章节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讨论，并将充分展现全书尽管有着潜在的重大意义，但却没有极大的时代局限性的总体特征。

H. D. L

第一章 生活史与政治科学

政治传记大胆地纠正了对体制性的“机制”、“结构”和“系统”研究的过分强调，作为政治科学的一个领域，政治传记一直备受推崇。正如戈奈斯特（Gneist）和戴雪（Dicey）的评论所阐释的，下议院、上议院、君主和选民的法律地位与一贯立场，透过莫利（Morley）的《格莱斯顿传》（*Gladstone*）、斯特雷奇（Strachey）的《维多利亚女王》（*Victoria*）或者李（Lee）的《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的透镜效果来观看时，就会突然呈现出新的意义。当你已经研究了俾斯麦（Bismarck）或威廉二世（William II）的生活，拉邦德（Laband）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论》（*The German Imperial System*）就显得更为鲜活和难以超越。要对美国的宪政发展做体制性解释，如果缺少对马歇尔（Marshall）的生活和林肯的生活的解释，就只能是一些缺少丰富而富有人情味的历史的糟粕。缺少传记的政治科学就像剥离了血肉徒有其表的动物标本。

当喧嚣的社会生活被剥皮去肉变成了先例并加工制作成原则，这种作为结果的抽象遭受了一个奇怪的命运。它们被分类重组，直到这个成品的马赛克可以构成一个逻辑和审美的整体，这早已与原初的现实中断了任何有效的联系。概念正接连处在对确定事件失去参考作用的危险之中。像自由和权威这些观念在沿袭了这种诱人而且只需稍作改变的抽象路径后，它们就需要新的衍生含义。如果概念只是为这种想法服务，而不是掌控这种想法，它们的专业术语就必须时不时地接受最严格的审查。

“体制性”分类对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用途是不可缺少的，但采用它们的宣传家很少评论“个人”的影响，虽然它们修正了预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领导能力在预测事件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变量，这已不是新闻，但论政治的一流论文已越来越不提供各类的煽动者和组织

者的特征，也没有谈论致使这些差异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个人经验。

在有关政权理论和政治理论的书籍中，譬如像英国人西奇威克（Sidgwick）和拉斯基（Laski）写的，美国人加纳（Garner）和威洛比（W. W. Willoughby）写的，欧洲人耶利内克（Jellinek）、施密特（Schmidt）、契伦（Kjellén）和凯尔森（Kelsen）写的，都存在上述局限。毫无疑问，这些人拥有或已经具备对政治现实的切身感受（living sense）。西奇威克非常善于用深刻的评论、有趣的轶事调侃公众人物，在几小时内就让周围充满愉悦，我们谈论他的作品总会想起他的这一特长，但实际上政治的“人性”在他的作品中实属鲜见。政治传记一直备受推崇，主要在于它传达出一种世间人事不可预知的感觉，美化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最棒的是，政治传记对于理解人物个性相互区别的因素功不可没。但文学传记或自传文学忽略或扭曲了许多个体的生命史，现代调查已发现的许多重要事实在这种缺失生命史的作品中极其有限。

从哪里有可能确保被忽略的日常习俗、为社会学专家与心理学专家所采用的、对个体发挥着肉体上的影响的生活史资料的供应？现代社会中这种材料有相当大量的收藏，它们迄今已得到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的关注。我指的是那些患病个体的病历，特别是那些曾在医院或疗养院被看护的病患。^①

虽然在普通医院获得的材料具有价值，但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事实中最丰富的部分是在照顾精神紊乱症患者机构的文件中发现的。在一个好的精神病医院中，患者的病历是一份由多人撰写的档案。有一份关于病人身体状况的报告，显示的是他认可的机构对他进行的例行检查。这可能由以前和后来的检查笔录来增补。我们也会发现，主体从一般智力和特殊能力测试中获得评价。还有一份来自精神科医生的初步面谈和诊断报告。在职工会议（staff conferences）上这份报告会当着病人的面由会议记录摘要详细解释，隶属于这家医院的全体医师以及精神科社会工作者都要出席会议。

^① 参见哈罗德·拉斯韦尔：《作为政治人格研究方法的病人研究》（“The Study of the Ill as a Method of Research on Political Personalities”），载《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29年11月。

按平时惯例是由这个医师和社会工作者负责提出病例总结，介绍病人的入院观察情况，并在病人被护送出房间后，就诊断和治疗进行全面的会诊。会有几次职工会议专门讨论病人是否可以出院，有条件出院，或转院，病人可能在开会前被带来。在他呆在这家机构的期间，护士连同巡视查房的医师们都对病人的行为做描述性评注。社会服务部门与亲戚、熟人联系，编写该主体的传记。有时病人会自愿写一本自传，被归档为一般记录。与对案例感兴趣的人联系经常会揭露出宝贵的细节。这些物证通常包括病人在病前、病中和病后写的信件，连同发表的作品、绘画、照片和一些塑胶制品（plastic productions）。在某些情况下，已被接纳、出院或转院的单个病患的记录会有很多卷。

由于对将人格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重要性愈加重视，现代医学者都愿意并急于搜集家庭、商业以及娱乐关系中（recreational relations）的个人行为资料。这些事实往往有益于医师做出诊断，并决定如何处理病人。现代人强调幻想在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和兴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致使包括个体的午夜梦、白日梦、抱负、不满、热情和忠诚在内的资料都有人搜集。病患者有在与医师面谈时，他的作品经常被在场的某个速记员用自己的话记录下来。对这个个体而言，所有这些心理和社会学的资料都使个案记录更为重要，达到了研究个案记录就可以了解这个人整体发展史的目的。

有时这些病历关系到没有精神错乱的人，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也被委托观察。德国政府并不是唯一在战争后期为了避免出现内部纷争有时采用权宜之计把和平主义者派到精神病院去治疗的国家。在这些情况下获得的这种记录常常是没有病的男性或女性，这些记录有助于限定以病理学个案研究为依据的结论。

在一个病患的记录中，具体的病理特征往往很缺乏。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一个大城市的市长，由于患了酒精中毒性精神病（alcoholic psychosis）和震颤谵妄症（delirium tremens）被送到精神病院。当时他正在熬过这个急性酒精中毒期，他只是“精神错乱（insane）”（用一个不科学的词），所以很快就出院了。但他在谵妄期所说的话的记录，会比很多页的传统传记更能揭示他的政治生涯的较深层动机。他所经历的这些幻觉和妄想，并不能完全一成不变地被视为患病。由于他已难以自控，他内心的幻想生活

就得以清晰地显现出来，他的人格结构被暴露无疑。另一个政治家没发现什么异常，但他有收集女子鞋跟的倾向，并由此找到性刺激。他看了心理医生，治好了恋物癖（fetishist perversion），在看心理医生过程中，他准备了一个档案，该档案能够密切揭示出一定政治兴趣的根源。从政治学家的观点上看，在他的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恰巧与狭隘且有局限的病理症状相去甚远。

一些记录的价值因如下事实而提高：除了病患的病理研究成果外，那些记录还包含许多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当他又回归常态时自愿提供的。某些精神错乱的形式显示出精神障碍与常态的周期性间隔，并且，在“清醒”的间隔时段中，病患者能够提供自传资料。通常这种个体病情的“好转期”持续好几年，尽管它们也有可能很快。另一种精神疾病的形式具备以下特点：如果采访者一点也不了解病患者，那么该患者很难围绕一个单一的思想体系以保证他们被当做正常个体去对待。从上述观点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与常规的印象相反，病患治疗康复机构所发现的历史绝非单单局限在病理科或仅仅是这个人的病理方面。

在这本专著中所总结的生活史，有一些来自精神病院，其他部分则是从那些不在精神病院以及对精神病理学不太重视的志愿者中收集而来的。他们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用同样的关心去研究“正常”个体，就像平时对异常个体一样的呵护，那么，我们将会增长许多关于政治中人性的知识。

因此，本书既包括“病患者”，也包括“健康人”。这些材料大都是第一次印刷出版。书里没有历史人物的学术史回顾。该研究与以往研究的关系在于，它被限定在政治上那些有趣的人物身上，而与这些人物有不寻常亲密关系的专家已经对他们做了研究。

这次尝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政客都“精神错乱”。实际上，对于揭示不同类型公共人物的发展轮廓这一核心问题来说，具体的病理是次要的。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要以牺牲该人格的主要模式为代价去列举出相应的症状。卢梭是偏执狂，拿破仑有个部分萎缩的生殖器，亚历山大（Alexanders）、恺撒（Caesars）和布卢彻（Blüchers）都是酒鬼，加尔文（Calvin）为湿疹（eczema）、偏头痛（migraine）和肾结石（kidney stones）所困扰，

而俾斯麦有歇斯底里症，林肯有抑郁症，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显示出惧内的特征，还有马拉（Marat）患有关节炎（arthritis）、糖尿病（diabetes）和湿疹，如果我们只了解这些，那么我们还没有结束研究。虽然精神病理学合理且实用，但病理学并不是我们研究的终极目的。^①

这本书的目的也并非是要胡乱收集一些反映早期经历与政治特征和兴趣之间关系的孤立的秘闻。并不是说这类事件不对外开放。当我们发现了公共行为的个人隐私基础时，我们有关“政治动机”的常规方案似乎诡异地游离了人类生活的多重现实。任举一例来说，约翰·B.（John B.）先生，一个忙碌、有进取心并且很成功的推销员，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关心和帮助盲人。他从生意中抽出时间为盲人机构理事会服务，与此同时，他还代表盲人处理了许多财政事务。还没有立法委员会之前，这些着眼于改进公众或私人对不幸者关心途径的措施都是由他在这种平台以及个人会议上支持实行的。研究他的早期记忆，我们最终弄明白了这个事情，他对盲人的强烈兴趣是根深蒂固的。当他三四岁时，他的妹妹把他最喜爱的猫的眼珠抠了出来，这令他十分痛心。而他关心自己宠物的安全就是他成年后从事盲人保护工作的原始驱动力。关于这种“关键经历”的记录我们可以列出很多章，而它的作用远比通常所猜测的更为重要。

如果诊断结论和孤立的秘闻并不能使我们满意，那么，我们想要什么呢？答案可以这样简单地给出：我们想要发现那些对于政治特征和兴趣都极其重要的阅历。这意味着我们想找到隐藏在那些煽动者、管理者、理论家以及其他活跃在公共舞台上的人物类别背后的东西。我们能否将人的人格发展设想为一个功能整体，并弄清楚各类政治生活模式成长中的转折点？我们能否发现那些典型公众人物的典型主观史？我们又能否把这种主观的历史与那些有发展性意义的物质和文化因素相联系呢？

即使如此，这一野心勃勃的工程也无法详尽阐释该研究的所有范围。我们想知道这种对生活史的深入调查能否或多少地加深我们对于整个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理解。当他们逐一体验到自己的生活猛然陷入差别悬殊的文

^① 这种文学的最好概括是 Wilhelm Lange-Eichbaum, *Genie-Lirsinn und Ruhm*。另见爱尔兰、罗素、莫比斯、古尔德的作品。

化网络时，一个霍屯督人（Hottentot）^①或美国人的生活史揭示了意象与情绪的具体实况。社会上受过教育训练的学生可以辨别出大量文化模式，而这些文化模式在人类经验中的全部意义只有通过获得暴露给他们的那些人的主观历史才能被揭示出来。在有些文化中，孩子被扇耳光、鞭笞和殴打；在有些文化中，孩子很少成为体罚的对象。这是否就意味着生存在第一种文化中的孩子会在社会生活中怀有复仇心理并且钟情于暴力呢？在有些文化中，从四岁到十四岁，父母的控制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另外一些文化中，这种监督则十分严格并具有持续性。那么，这会对两代人发展中的世界观产生怎样的差别呢？即使是那些在同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也会在社会实践中显示出微小差异，而我们则希望通过对有这种经历的人的观念研究，去弄清这种差异的结果。

这本书适应了社会科学领域中势头愈加加强蓝的一种趋势。如今，社会科学已经转入对政治个体的自我解释进行深入研究。这是很难用“对于人物传记的兴趣”一语来表达的变化，因为“传记”这个词充斥着不相干的文学和史学含义。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并不是他所想所做的每件事的编年表，也不是对他的经历仅凭印象的解释。生活史是一部自然的历史，而这种自然史所关注的是发展的重大事实。地球的自然史并不是包括在这个序列中的所有事件的详细叙述，而是对该序列中主要变化进行有选择的解释。已经历的大事件是有很大影响的，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因为它们标有日期，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那个时段。当传记被看做自然史时，它的目的就是选择并挑拣出发展的主要时段，还有就是查明他们的独特模式。

作为自然史的生活史研究是一个晚近的现象。而社会科学也是刚刚开始运用这一方法。在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去准备他的伟大理论体系之后，孔德（Comte）居然到最后看到这个顶点不见了，于是，他在弥留之际疯狂地尝试临场发挥，这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他预计的论文是解决人的个性

^① 南部非洲的种族集团。自称科伊科伊人。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南非。一般认为属于尼格罗人种科伊桑类型，但更像是远古蒙古人种的残存后代。使用霍屯督语，属科伊桑语系。分多种方言。有新创制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霍屯督人的体质特征和语言同布须曼人相近，因而他们合称科伊桑人。

发展与分化问题 (La morale)。但论文终究没有完成。在孔德对公共机构的长期关注、对人性研究可行性的迟来的认可中，在他弥补漏洞所进行的仓促努力中，在他已取得成果的零星片段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对社会科学的历史有象征意义的东西。这时的社会科学正处于一种滞后的、匆忙的和支离破碎的成长阶段。^①

法国社会学家没能发展孔德研究的零星片段。文化比较形态学 (the Comparative Morphology of Culture) 变得十分吸引人，而它关注人们的无声行为，偶尔也涉及人们的思想。孔德在他早期著作中写得十分清楚。涂尔干和涂尔干学派 (Durkheim and the Durkheimians) 对原始人的心理过程加以研究，此时，为了揭示思想极其抽象的“形式”，而不是揭示不同社会条件下人类经验的个体次序，这些“原始心态” (primitive mentalities) 都接受了严格的审查。那些为了弥补差距而做出的努力正是依靠这些没有经过整合的经验数据，而且，我们通过对提高数据可靠性的方法论问题进行非批判性反思强化了这种努力。在法国，那个时代最有希望的迹象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综合方法，而社会心理学研究正是由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的布隆代尔 (Blonde) 发起的。

在德国，社会科学家如此专注于施特赖特 (Streit) 或马克思以及比较史学学派 (the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chool) 的胜利，以至于人们只沉溺于遣词造句，主观史的比较形态学没有出现。康德在指导多元认识论精义这一领域里的巨大影响力，使人们对心理现象的思考模式化，偏爱高度抽象。物理学的伟大成就似乎要依靠现象的无情分化与再分化，直到它们变得适于操纵与控制。康德式的敏锐与科学的原子论相结合，可以产生生理心理学的偏激，也可以产生蒙昧主义对人格的神圣奥秘服从于粗鄙无礼的精确调查的强烈反感。说来也怪，当代的人格研究被当成了对抗实验室研究的主力，并且，这还意味着向对科学不敬这种精神投降。人格可以进行比较和分类。这方面的先驱就是狄尔泰 (Dilthey)，一个哲学史家；但是，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后继者，都没能将现有的有关亲密的主观经验的解释收

^① 参考德·格兰奇：《社会科学中的方法：一本案例书》一书中的分析1，是关于孔德的方法论一文中对这一问题极好的回应。

集出版。社会学对团体的过分强调在西美尔（Simmel）有关个体性的理论说明中只是被部分地补充完善，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并未对类别与实事进行适当的综合。这个领域的人类学家忽略了去收集带有自传性质的记述，而为了比较原始人类与现代人类在内心生活方面的异同，就只有菲尔坎特（Vierkandt）良好的感知能力才能以此为目的，这个任务比法国学者完成得更巧妙。拉扎勒斯（Lazarus）和斯坦赫（Steindhal）对早期社会心理学的推动促使他们搜集了大量民间传说材料，然而，套接这些民间传说与民间代表人物发展史研究方法的这一任务终究没有完成。

在人们主观领域内做出伟大创新的人是弗洛伊德。他释梦的著作是历史上最奇特的自传之一，他的作品为那些想要记录下无拘无束的人类心灵之真实流露的人做出了榜样。记录人类心灵的无所不能，并用批判的眼光去考察它以发现人类精神生活的规律，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弗洛伊德突破了那些传统的无关紧要的障碍，并且，他把人们从盲目信任数据的黑暗时代带到了重视调查实践的光明时代之中，不仅提出理论应经由数据来检验，而且还专门设计了保护数据安全的特殊程序。

作为文化研究的一种资源，那种匿名的私人生活史档案尤其是托马斯·威廉一世（William I. Thomas）的作品有了科学的潜质。他与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合作完成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一书的出色研究。有一卷专门就是一个长篇自传，其中包含了一个从波兰移民到美国人的生活中最隐秘的事实。托马斯的著作通过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给美国社会学留下了永久印记。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美国人类学的泰斗，他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原始故事”，而且，他已经搜集并极力主张搜集许多这样的档案。保罗·雷丁（Paul Radin）在191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一位温纳贝戈县（Winnebago）县长的生活史。而“那个男孩儿自己的故事”的重要性最早由威廉·希利（William Healy）在他的一项有关青少年罪犯的研究中提出，并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

因此，我们要表达的是一种在社会科学中已完全树立的旨趣：强调政治学中个体经验的具体序列的研究价值。我们对全面而隐秘的历史的追求，导致对一种相对较新的材料资源（医院的病例记录）的发掘。这种追

求已引起了精神病理学研究方法的推广应用，而这种方法用在对那些正常志愿者的研究上，是对来自医院病例所做推论的检验。同样，这种追求已引起对作为人格研究（尤其是精神分析）的一种方法——长期访谈法的详细研究，还程式化了改良的调查方法。这种追求已促使了国家职能理论综述的产生，该理论直接起源于对真实生活史深入仔细的观察，有个人经验的丰富背景做衬托，政治形式的内涵也变得栩栩如生了。

诚然，这些研究并不完整。这些档案还无法摆脱各种各样的不足，这些缺陷已被恰如其分地详细说明。同时，手边的档案数量也十分有限。谨慎对于使用延期出版的材料有很大帮助。但是，某些积极的优点已经超过了出版物的诸多异议。这样一本材料汇编的出版物将有助于政府学专业的学生精通各种事实和解释，这些事实和解释目前在致力于重点领域研究的专家中是通用的。精通这些事实和解释在涉及人格史学时尤其必要，因为这种素材中有些是离经叛道（unconventional）的，所以一些纯洁的读者最初总是会觉得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是，如果科学为传统所束缚，那么科学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其中的一些事实可能并不美好，并非斯文谈话的话题。然而，为了诊断疾病、了解健康状况，那些与人体排泄物打交道的医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并不一定受陈腐与高雅的限制。并且，如果政治科学能少一点虚假、多一点真实的话，那么，就必须有客观处理各种事实的原则，而这些事实对于人类特征与兴趣的了解无疑是重要的。

于是，精通事实和解释正是这项研究的一种功能。另外一个目的，则是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建构人格成长的试验性假说。最起码的效果是，这些有关煽动者与管理者成长的假说将会使调查更尖锐。也许，那些能直接接触到更好史料的人会被迫运用这些史料去检验和修正此中展示的还正在使用的概念。

本书的总体架构是：开始的一些章节是在精神病理学的历史背景下概述其观点，并对政治类型的时下标准进行述评。接着谈精选的生活史材料。结论章节讨论人格研究对一般政治理论的意义，另外，还批判了现存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精神病理学的方法

在人格研究的路径中长期存在一个的障碍，即在人格研究进展的任何已知的代表作中，要把人格描述为一个整体都很困难。这一任务困难重重，令研究人员颇感失望，经院心理学长期以来回避这一问题，而将精力投入到对人物细节的细微探究中。个人生存环境（刺激物）的方方面面怎么矫正了个体特定部分的反应，生理心理学手册（*The manuals of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对此进行了详尽叙述。这些手册里明显遗漏了一系列还管用的概念——对作为人格研究中调查对象的现象进行归纳分类。即使所有这些现象具有“物质”的共同属性，缺少新造的专业术语来区分高原、平原、山脉和大陆板块，要建立地质学学科也是不可能的。令地质学家感到费解的不是这些东西的相似之处，而是他们的区别是怎样产生的。许多经院心理学（academic psychology）追求精深和名声，已经放弃对入门问题的研究，取而代之的是生理学的微观领域。这样一来，为理解人格所做的专门研究，检验其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就没有了标准，因为它没有了人格的主概念。

精神病理学家还不能回避把作为整体的人格来概括的必要，因为他已迫不得已要对作为整体的人格的将来做决定了。如果解除严密的监控，精神病理学家必须不断认定约翰·B. 和玛丽·C.（Mary C.）是自杀还是他杀，或者他们是否将成为组织中的可靠人物。因此，临床医生已经发现，相当有必要去搜集与个人主要的社会调节能力相关的具有高度预见性价值的迹象性资料。

当人格中通常从属于其他特征的许多特征摆脱了控制并且占有巨大比例的时候，精神病理学家可以更好地观察到它们。诊疗漫画（the clinical caricature）鲜明地突显了一个充分运行的人格的全部倾向，并将注意力集